

当代澳大利亚新闻教育范式之争^{***}

□吴满意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摘要] 本文在科学史家库恩“范式”界定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当代澳大利亚新闻教育界著名学者的观点,在新闻职业化教育、新闻教学和研究的体制支撑、研究主张和教师的应对措施等方面作一描述。

[关键词] 澳大利亚; 新闻教育; 范式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5)04-0094-04

澳洲自囚犯乔治·侯(George Howe, 1769-1821)1803年出版《悉尼公报》便开始了新闻的历史。而真正在高校中试图通过新闻教育培养和训练新闻工作者,则是20世纪早期的事情,最早进行新闻教育的学校当推位于布里斯班(Brisbane)的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1921年便设置了相关的课程学习。然而时至今日,澳洲新闻教育界依然围绕着培养目标、理论与实践性教学的关系等问题存在着争论,焦点则是在职业能力训练和丰富的教育课程设置中如何保持真正的平衡问题(亦即理论与实践的比重问题)。本文结合范式(paradigm)的理念^①以及澳洲学者的有关论述,在新闻职业化教育、新闻教学和研究的体制支撑、研究主张和教师的应对措施等方面作一描述。

一、关于新闻职业化教育之争

面对“新闻是什么以及作为与实际工作性质不同的高校环境中新闻的技巧和能力怎样培养”等问题,高校的新闻教学和研究不能不给予回答。怎样才能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呢,学者们围绕着以下层面展开了分析与讨论。

(一)关于教育和专门知识问题

关于澳洲新闻教育的讨论经常被新闻编采人员圈定在职业化框架中,如专门化技能、较好的写作都是基础性要求。在澳洲,这些专门化技能主要在本科阶段完成或达到相当于本科毕业水平。Wollongong大学是在本科水平上提供这些新闻教学的唯一的学校。在教学中,其他的教学内容还包括引导学生通晓和熟悉法律条款和伦理规则、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对新闻工业和市场制约下的新闻运作方式所支撑的自由党民主理念的理解等。

学者们认为,新闻研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应被界定为在

工作时段需要怎样发现和展开一个好的新闻故事。例如,Grundy(1990年)指出:新闻教育和研究应利于学生搞懂“信息在哪、怎样获取信息和怎样使用它们”等之间的联系。他主张给学生讲授图书馆搜索、公共文献搜索、FOI点播以及其他的电话投票和报道技能^[1]。

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估价主要基于其能否采编和展开新闻故事。当然,学生要学一些人文社科课程,以便养成长期阅读的习惯,强化分析能力,提升整体水平。这种教育范式与在昆士兰大学举办的、澳洲最古老最有声望的新闻讲座紧密相连^[2]。

(二)关于基本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

专挑当代澳洲新闻实践之刺儿的教师们,经常构思不同的教育框架。众多专家认为,通过教育而入门,一定能提升对新闻实践和日常工作中相关问题的批评意识,能促动学生获得更多不同的实践方式。应该说,这种教育方式有重要价值。除学到更多的常规新闻制作能力外,学生们还可学到“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这些“解决问题”的能力提供着“Modus Operandi”(操作方式)以便应用技术性能力,如写作或广播。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学习识别故事、搜集信息、获取信息源头和制作新闻。相对于单纯学点儿知识、理解关于新闻伦理、媒体法规或新闻过程与结果的理性条目而言,这种方式有利于学生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以应付来自在实际工作中遭遇的伦理、法律、同行和商业的挑战。

在新闻教学中,Griffith大学和Newcastle大学都使用了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育教学范式^[4]。Griffith大学的新闻教学由Michael Meadows设计,由7个题目组成,而学生在学习前要完成4个先决性的基础能力题目,而教学中则提供学术写作和研究能力介绍。这种新闻教学阐明的观点是:帮助学生发展批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亦即不仅仅提升他

• [收稿日期] 2005-11-20

•• [作者简介] 吴满意(1964—)男,电子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副院长,2005年2-7月昆士兰大学新闻传播系访问学者。

们的普通智力应对能力,也要提供一种使他们能系统总结自己创意和实践的方法,以便于他们习惯新闻的准则并践行。

(三)关于反思实践和对待技术变化问题

反思实践教学(Teaching as a reflective practice)是随肖恩(Schon, P. 1983)《反思的实践者》出版而出现的新的教学范式。在美国,它是一个从职业实践的常见概念中引申出来的教育观点,目前在欧美日益流行。肖恩认为,教学过程应该是一种对教学实践的不断反思过程。此范式将教学看成是一个发展性的概念,教师的教学可以通过不断的实践而得到提高。反思实践(Reflective Practice)是一种长期的学习方法,目的是易于胜任反思和从工作场所的经历中学习。在这种方法中,作为学科知识主干的专业知识应被理解和熟知,并通过研究或在工作中扩展其理解力和接受力。在一个特殊的职业领域内有效性工作,有效应对那些引发社会错综复杂内容与变革结果的各种新的挑战,专业知识则被包括在理解力和接受力之中。有效性和有效率关系着系统性反思的实践和对工作经验的估价,以及能否拓展恰当的知识或谋略以提高对未来类似状况的应对能力。

在澳洲,相对于记者的专门知识而言,反思实践(Reflective Practice)是一个支撑记者具体工作方法的特定的变种,确切讲,对于教育面临的日益增长的新技术的冲击,包括混合媒体形式和新闻实践的凸现,教师们在新闻教学中采纳了“反思实践教学”(teaching as a Reflective Practice),并作为一种应对措施。通过强调个体性,学生应熟悉互联网和掌握新闻实践关键措施的计算机辅助工作与录制技能等。为学生做好面对“新闻高速变化的技术背景”的准备,作为一种独特的呼吁,反思实践刚提出,许多来自 Deakin 大学和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的教师便提供了一份关于训练新的新闻记者与互联网打交道的专业报告^[5]。与新技术挂钩成了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四)关于新闻的革新实践问题

在澳洲的部分高校中,有些教师围绕提高澳洲社区居民智力水平的兴趣范围设计他们自身的工作。在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UTS) 基础之上成立的澳大利亚独立新闻中心(The Australian Centre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 (ACIJ), 是最著名的新闻教师团体。

在部分学者看来,新闻教育的目标是能增加记者与新闻业自主介入和创造比仅有市场爱戴更多的社会需要的新闻覆盖面。基础性的学习和较强的技术能力是十分重要的,但职业化的介入并不影响记者决策过程或记者的技能问题。同时,无论哪一种新闻媒介的实践,记者介入都应有明确意图,亦即承诺能够分析和思考澳大利亚的自然和生活质量,并作为介入的主要原则。例如,UTS 本科生新闻教学手册中写到:“UTS 的新闻教育是建立在公众知情权基础上的职业化新闻原则。这一目标能使学生明白记者所扮演的角色,创设传递不同社区居民的声音,提供居民讨论和咨询有重大影响问题的论坛等民主的公共领域。”

在新闻教学研究中,工作关系调查被设想出来,但是这种

需要考虑前后关系的调查却限定和制约了新闻工作实践。怎样处理记者、研究者和公众之间的关系, Bacon 等人强调了对对话的重要性,并认为教学研究可能会导致理论的发现,在一种革新职业实践中,应尝试“去做能引发思想的新闻”,或者“激发关于新闻报道的公众对话”^[6]。

其实,不同的学校和不同的教师在实际中会通过不同方式展示出不同的教学和研究侧重点。因此,新闻职业化教育若想在理论与实践两者之间获得恰当“平衡”,应该说是有较大难度的,其中涉及到作为记者的操作方法(Modus Operandi),是否比新闻知识更重要;适合于教学实践的问题比之于那些支持为学生讲授一个操作方法(Modus Operandi)是否更具有意义。不可否认,人们认同大学在鼓励变化和革新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但在新闻的教育教学与研究方面,澳洲的学者们则是各执己见。一部分专家将新闻教学看成是提升学生在工作场所的伦理践行、写作水准或保持与技术变化并进的问题;另一部分专家则想创设做新闻的方法,强调职业化教育的组织性问题。甚至有专家还认为,之所以讨论新闻的学习与研究,是因为它关系着新闻的学科性等问题等。

二、关于体制支撑问题之争

在人们关注教育教学的内容、方式方法等诸多问题时,往往容易忽略教育教学得以正常开展的物质性保障。澳洲的新闻学教育专家们在此问题上则表现得极为敏锐。他们认为,一方面,这一领域的发展取决于人和物质资料基础的有效性利用;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已有的体制或巩固的程度。然而意见并不统一。

(一)关于基础条件问题

Patching 教授 1997 年所做的针对澳大利亚 22 个本科新闻教学院系的调查中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材料。例如,在 1997 年,5 个最大的新闻教学单位是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昆士兰理工大学(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悉尼理工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RMIT (the 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和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昆大和迪大吸引的本科生最多,并且昆大拥有全澳洲专职教师(full-time)最多(9人)^[7]。Patching 发现,教学是新闻教师占支配地位的行为。表中列出的 22 人,只有 6 人谈及了科研工作量的额度。昆大员工中的情况则是罕见的,每年工作量的 1/4 用于搞科研;在学历方面,全澳 82 名新闻教师中有 69 名接受了大学学历教育,而获得博士学位的仅有 12 人;在 90 年代中期,Patching 作为一项主要的研究行为对该领域博士和硕士的论文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原有的 20 名新闻讲师成为博士,14 名则成为硕士(其中博士的题目包括新技术、新闻伦理以及 1987 年以来的新闻教育史和针对少数社团的新闻作品)。此外,他还提到了 3 个主要的已被发现的研究课题,其中 2 个在教与学中应用了新技术,另一个则是研究关于当地政府的新闻与公众关系(public relations)问题^[7]。

在研究中专家们发现,自1989年以来,澳洲独立新闻中心(ACIJ)作为澳洲仅有的一个新闻研究组织,一直没有一个对其研究能力工作的系统评估。尽管它在册学生较多,出版物一般也被看成是重要新闻课程的设计源头和必读作品,但是该组织对澳洲新闻主干知识的贡献依然模糊。显然,对于一个极有可能成为训练未来新闻教师的组织以及它的研究领域,存在上述问题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二)关于新闻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战略问题

1997年,Breen,Patching和Lee强烈主张新闻教师在学术兴趣方面进行更多的“管理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他们在一篇辩证看待课程体验调查表(CEQ)的文章中就三个学术方面的问题提示Charles Sturt大学的同行应该去“在变动的时代上演管理游戏”。他们认为:成为学习中心目的是,新闻教师为学生选择和组织有关资料,引导学生,并将此方式提供给问题讨论的设计者。这样,学生可以在利用资料的基础上作好讨论。当然,教师也应关注不完善、不正确的资料使用或实际中不恰当地使用了资料,讨论效果较差的负面效应^[8]。

依据他们的看法,首先,这种“管理游戏”是由考虑新闻教师工作状况评估的资料构成;其次,这种“管理游戏”表明,基于TER(Tertiary Entrance Ranking)成绩的课程需求状况对比以及对学生对教学或讨论满意的CEQ证明是没有价值或意义的;再次,这种“管理游戏”认为,设置独立的研究生监测和分析工作目标^[8]。

其实,早在1989年,作为昆大新闻系首席教授的Henningham为学科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更加全面广泛的战略,而这个战略的大纲在1988年致函澳大利亚新闻教育协会时就被提出。该战略主要论点包括:

- 1) 确保部分自主权,创设研究硕士学位教学与课程。
- 2) 创设研究生课程文凭,提供核心课程和资格鉴定,提供同规格的教与学。
- 3) 为教学和研究获取产业资助与筹集资金。
- 4) 通过国内外的学报公开出版论文、著作,增强学术研究能力。
- 5) 专家评估与媒介状况估价。

当时,此种论点很难被接受。例如,曾在澳大利亚众多私立学校和Bond大学Gold Coast校区任教的Pearson教授,是反对此战略的著名代表。自从1991年以来,他一直警告:不能从教学中抽调资源去支撑最特殊的研究者进行新闻战略项目的研究。他认为:“花时间研究教学耗费或许是值得的,对学生而言,它正常服务于利益共享者需求。其他员工班级数的增大和专职研究人员课时减少两者相抵而成为常数,忽视学生的问题也就解决了。”^[9]

而作为Griffith大学Nathan校区新闻教学召集人的Michael Meadows教授在工作中发现并提出了“有效管理社会信息与创意流动的‘文化资源’”的观点^[10]。Michael Meadows教授没有鼓噪新闻的学科发展,却提出了发展澳洲新闻教育的战略。基本论点包括:

- 1) 关注基于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解析能力问题的研究。

2) 对小的、灵活多样的大学基础新闻教学提供资助,减少课程纬度,增加课程深度和学生的经验接触。

3) 聚集于革新新闻实践,增加在本地媒介和本国主流媒介报道中的比重。

4) 基于国内经验的国际化比较研究。

与Henningham的观点比较,Michael Meadows教授的思路没有显示出对相应资源和方案可行性的有力论证。因而,他的建设性战略在澳洲的新闻教师中未获得公认。Bacon副教授对此种现象评论到:“新闻教师,从不与文化相联,经常疏于发现在文化研究中不同的讨论和动态,错误地肢解文化研究、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茧自缚,对各种观点、评论置之不理^[11]。”

三、关于研究主张和应对措施之争

近年来,澳洲新闻学界围绕“赞成还是反对新闻研究”问题产生了一连串的争论,争论集中在“文科教育”科目能否最好地满足新闻训练以及怎样最好地将其合并进总课程之中。同时,部分学者鼓励同行调研学生的就业状况及其学生对课程的反馈意见。这是争论中较为重要的话题。

(一)关于核心课程问题

直到2001年从昆大突然辞职,Henningham教授是主张澳洲要依据美国大众传播传统进行新闻研究和教育的最一贯的提倡者。他的最具争议的观点是,1994年提出了澳洲新闻教育应坚持的10门课程的核心课程计划。有趣的是,重新审视当时的情况,这个建议是对那个基于“研究”必然能加强高等教育教学假定的学术范式的最清楚的阐释。其中包括了三个大众传播科目(新媒介理论、国际媒体、新闻与社会),一个研究方法的科目以及针对提高学生普通智力能力的伦理与法律科目各一门^[12]。

在澳洲新闻教育界,Henningham独占鳌头。没有其他的新闻教师能象他一样在研究学生需要和新闻问题的争论方面有如此广泛的看法或观点。当然,有时他提出的观点也会遭到强烈的批评。如,Pearson谴责到,以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狭隘与荒诞的内容来支配澳洲业界,简直就像乌托邦(Utopian)。在Pearson看来,90年代中期,Henningham在昆大开设的课程仅仅是澳洲新闻教学中“可能适合的范式”。替代或者制定新的核心课程,应该通过“基础质量控制测量”方法负起对学生的更大责任。从而,Pearson强调应优先考虑对学生学习结果测试的程式化操作方式。他认为,学生通过实验研究小节目的种类或许能展现对于关联更多的、资源丰富的、大都市基础节目所具有的竞争优势^[13]。实际上,Pearson也未清楚地阐释是否或怎样的研究行为或发现故事的行为能提高学生自身学习和实践的价值。

近年来,随“文化研究”理念引入媒体研究领域,Henningham的关于澳洲新闻教育研究应置于美国传统的主张显得暗淡。但他依然故我,即便推荐新人到该领域就业,都强调以经

验和技能为前提^②。

(二)关于文化范式的讨论

文化范式的提倡者是 Meadows。他抵制 Henningham 的美国式的新闻教育方式,并称之为“过时的、乏味的”。Meadows 坚持文化研究的价值,认为文化研究由极为广泛的理论与方法构成,文化研究生产了“新闻最有用的理论分析”。对此,Meadows 分析到:“文化实践,比如象新闻,那里有大量的事件发生,有大量的不同种类的效果被生产出来的恰当的场合。文化研究是非简化的方法,这意味着它能识别出对现实而言所具有的多方面的要素。”^[10]

Meadows 在 Griffith 大学的新闻教学并未尝试以带有特殊研究方法的学科基础科目讲授新闻,他期望学生通过学习相关人文社科课程而获得新闻所需的学科知识和研究能力。相对于讲演、辅导课等基础科目的学习,新闻科目的学习采取了实践性的、灵活的做法。

不可思议的是,当人们以文化研究方式对澳洲新闻研究进行强烈批评的时候,竟然没有相应的文章对 Meadows 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做出点滴审视或评论,表现出极不寻常的沉默。

(三)关于新技术问题

Bond 大学的 Mark Pearson 教授和 Newcastle 大学的 Frank Morgan 教授,是研究新闻及新闻教育面临新技术冲击的关键性人物。

Pearson 的研究兴趣是从 1994 年开始的对新闻工业而言如何确保新闻教育的实用性问题。他认为,作为强化新闻研究的传统方法,将会被应用到对新媒体的研究中去;同时,新闻教师需要面对和接受来自信息技术冲击下的产业及新闻业的变化和挑战。媒体的趋同意味着新的混合性媒体即将出现,与记者的一般能力而言,新的发展态势需要进行新的学历教育^[9]。1997 年后,Pearson 在“互联网对新闻的影响”的研究中发现,在新媒体环境中,对记者而言,有 160 种以上的任务和实践需求^[14]。于是,他尝试将在线新闻(online news)能力的培养逐渐引入相应课程。

无独有偶,作为 IAMC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and Research) 当值主席和传指职业化教育方面的领导者、Newcastle 大学传媒艺术研究生课程负责人的 Morgan 教授也指出,传统的新闻科目设置原则对于 21 世纪的新闻职业化和媒体教育是难以胜任和不恰当的^[15]。他认为,全球化和新媒体技术制造了实际工作者和教师新的需求,因而,学术研究是构成课程内容展开的基础以及忽视教师教学讨论和学生学习体验的观点已经过时。此外,Morgan 通过 1998 年后参与的全球性课题“全球职业化新闻、媒体教育网络、网络新闻和课程方法”,从新技术应用、职业化教育等视角展开了对澳洲新闻教育和研究与国际业界的对接。

综上所述,当代澳洲新闻教学与研究意见众多,范式各异,但也造就了新闻教育和实践异彩纷呈的局面,这恐怕也是澳大利亚新闻业蓬勃发展位居世界前列的重要原因。

注 释

①范式(paradigm)一词是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在 1962 年提出来的,现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其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学者们在本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来理解的共同约定。不管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成员围绕自身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

②Henningham 在国内外出版了大量的论著,其研究的重点则集中在澳大利亚新闻记者的个体品质和新闻职业化问题。2001 年离开昆大后在 Brisbane 成立了澳大利亚私立新闻学校,招收一年制学生,培养的重点即是实际操作。

参考文献

- [1] Grund B. Teaching Research Methods in Journalism[J], Australian Journalism Review, 1990, 21(2): 154.
- [2] Kirkpatrick. Diploma to Degree: 75 Years of Tertiary Journalism Studies[J], Australian Studies in Journalism, 1996, 5: 256 - 264.
- [3] Meadows. Taking a Problem - based Learning Approach to Journalism Education[J], Asia Pacific Media Educator, 1997, 3: 87 - 107.
- [4] Sheridan B L. Problem - based Learning(PBL)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Is It New Jargon for Something Familiar? [J], Australian Journalism Review, 1997, 19(2): 59 - 72.
- [5] Quinn S. Australian Journalism in the Information Age[J], Australian Studies in Journalism, 1999, 8: 158 - 175.
- [6] Bacon W. What is Journalism in the University? [J],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incorporating Culture & Policy, 1999, 90: 183, 188.
- [7] Patching R. Who Teaches Journalism at Australia's Universities? [J], Australian Journalism Review, 1997b, 19(2): 33, 36 - 39.
- [8] Breen M, Patching R, Lee P. Tracking Research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J], Australian Journalism Review, 1997, 19(1): 161, 162 - 166.
- [9] Pearson M. Rethinking Quality on Journalism Education[J], Australian Journalism Review, 1994b, 16(2): 68.
- [10] Meadows M. Cultural Studies and Journalism[J],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Incorporating Culture & Policy, 1999, 90: 44, 47.
- [11] Bacon W. Shifting Notions of the Public in Journalism[J], Culture and Policy, 1997, 8(2): 74.
- [12] Henningham J. A Suggested Core Curriculum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J], Australian Journalism Review, 1994, 16(1): 90 - 91.
- [13] Pearson M. Rethinking Quality on Journalism Education[J], Australian Journalism Review, 1994b, 16(2): 68 - 71, 71.
- [14] Pearson M. Curricular Implications of the Influences of the Internet on Journalism[J], Australian Journalism Review, 1999, 21(2): 27.
- [15] Morgan F. Recipes for Success: Curriculum for Professional Media Education[J], Asia Pacific Media Educator, 2000, 8: 17.

(下转第 112 页)

(二)坚持实行“官督商办”,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

缺少“官督”则不能抑制资本的贪婪,保证公共产品的公益性;因此,政府应该把握好监管的尺度,既要引入和保护合法竞争,又要反对恶性无效竞争,最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建立完善的法律框架,应尽早制定《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其内容包括价格自由和价格控制,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企业间歧视,财政税收政策,私下协议,地方保护主义,市场信息,尤其要以制定和控制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产品的价格为监管的核心。而非“商办”则不能通过竞争,提高服务水平,增加经济效益。因此,要尽力避免把“官督商办”变为“官督官办”,因为中国“官督官办”的传统有些根深蒂固。

(三)避免投资主体多元化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出现短期寻租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寻租行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寻租行为^[5]。我认为它应该是指不同的投资主体因担心政府的失信而寻求短期的、对自己有利但却损害了国家和公众的利益的一种行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要加强政府完善各项法律法规,采用行政、经济手段对其进行严格监管以

外,更重要的是要强化投资主体自律机制,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前者重在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实现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又要弥补政府在管理和监督问题上的漏洞和不足。后者主要是指投资主体要制定适合于自身工作、管理和发展需要的规章制度以及职业行为规范。

参考文献

- [1] 朱仁显.公共事业管理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2] 吴东明.非营利组织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3] 美斯蒂夫·汉克.私有化与发展[M].管维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4] 李正义.以香港为例的公共部门变革管理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5] 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Government's Act on Investment Subject Pluralism of Public Utility

LONG Jun - ru

(UEST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re is a sluggish reform of public utility manage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government's public utility management is full of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Especially, investment subject pluralism hasn't been accomplished and funds for capital construction and business are in badly shortage.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some measures to relax market access and support civil and foreign investment on public management for the sake of changing government monopoly into investment pluralism and form pluralistic funds-raising system.

Key Words public utility; investment subject; government's act; operation privilege transfer

(上接第 97 页)

Arguments on the Current Paradigms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Australia

WU Man - yi

(UEST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describes simply the process how arguments on the current paradigms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Australia. The aim was to both summarize and advance the rich but scattered literature on journalism education. The result is a microcosm of the long-time academic debate, told through the condensed perspectives of many of the people who shaped i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ree principle contents: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debate,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research advocacy.

Key Words Australia; journalism education; paradigm

作者: [吴满意, WU Man-yi](#)
作者单位: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5, 7 (4)

参考文献(15条)

1. [Grund B Teaching Research Methods in Journalism](#) 1990(02)
2. [Kirkpatrick Diploma to Degree:75 Years of Tertiary Journalism Studies](#) 1996
3. [Meadows Taking a Problem - based Learning Approach to Journalism Education](#) 1997
4. [Sheridan B L Problem - based Learning\(PBL\)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Is It New Jargon for Something Familiar?](#) 1997(02)
5. [Quinn S Australian Journalism in the Information Age](#) 1999
6. [Bacon W What is Journalism in the University?](#) 1999
7. [Patching R Who Teaches Journalism at Australia' s Universities?](#) 1997(02)
8. [Breen M;Patching R;Lee P Tracking Research for Journalism Educator](#) 1997(01)
9. [Pearson M Rethinking Quality on Journalism Education](#) 1994(02)
10. [Meadows M Cultural Studies and Journalism](#) 1999
11. [Bacon W Shifting Notions of the Public in Journalism](#) 1997(02)
12. [Henningham J A Suggested Core Curriculum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1994(01)
13. [Pearson M Rethinking Quality on Journalism Education](#) 1994(02)
14. [Pearson M Curricular Implications of the Influences of the Internet on Journalism](#) 1999(02)
15. [Morgan F Recipes for Success: Curriculum for Professional Media Education](#) 2000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504027.aspx